



HUFENG IN MY EYES

我与胡风

上

增补本

晓风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HUFENG IN MY EYES

晓风 主编

我与

胡风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增补本

目录
CONTENTS

上

1

楼适夷

记胡风

13

吴奚如

我所认识的胡风

33

阿垅

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39

何剑薰

从一到〇(第一部分)

64

刘雪苇

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

74

梅志

人的花朵——记吕荧与胡风

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

——忆冯大海与胡风

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

哀史华

追忆往事——悼念雪苇同志

137

鲁藜

悼胡风先生

泪光篇(残稿)

——漫忆我与胡风先生

上

目 录
CONTENTS

- 242 胡 征
* 如是我云
- 233 赵 先
* 缅怀胡风忆往事
- 182 朱微明
* 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
- 166 贾植芳
* 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 142 王玉树
* 鲁黎的人生道路与「胡风集团」
- 351 侯唯动
* 从读者中走向胡风
——和胡风同志几次相见的回忆
- 341 冯白鲁
* 心声回荡
- 295 孙 铤
* 与胡风同命运
——片断忆「胡风分子」伍禾
- 271 邹荻帆
* 往事琐忆——怀胡风先生
* 刺否诗魂恋武昌

目录

CONTENTS

上

375

何满子

·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

一个小人物的遭遇

408

倪子明

· 记俞鸿模

419

王戎

· 《胡风杂文集》的出版及其他

· 往事非烟

444

彭燕郊

· 他心灵深处有一颗神圣的燧石

——记胡风老师

450

王元化

我和胡风二三事

——致胡风信七通及附记

473

杜谷

关于满涛之死致陈冰夷的信

482

冀沅

巴山夜雨忆胡公

· 历史法庭上的证词

· 活着的方然

540

马希良

· 一个中学生心目中的胡风

685

朱谷怀

* 往事历历在眼前

——记我与胡风的交往

632

耿庸

* 枝蔓丛丛的回忆

* 却说张中晓

558

绿原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

551

曾卓

*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755

鲁煤

* 「求诗辨假真」——我和胡风：

恩怨实录（第一卷）

* 我所知道的徐放与胡风的交往

741

朱健

——我与胡风

* 胡风这个名字……

708

路翎

——记我与胡风

* 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

704

张禹

* 他品格对我的影响比理论有力得多

目录
CONTENTS

下

812

牛汉

• 重逢

824

卢玉

• 胡风冤案与我的遭遇

842

李正廉

• 「一般分子」的「一般」苦难

851

罗飞

• 真的就是真的……

——忆我和胡风与阿垅的交往

• 为涉及我的几段资料

作补充和小释

891

化铁

• 逆温层下

919

顾征南

• 我所认识的胡风先生

944

于行前

• 我再述胡风与适夷的友谊

961

罗洛

• 我和胡风相识前后

984

李嘉陵

• 琐事杂忆——我所认识的胡风

• 良师与益友

——怀念胡风先生二三事

目录

CONTENTS

下

- 1061 朱甫晓
我的父亲与胡风
- 附文
- 1031 林希
十劫须臾录
- 1012 欧阳庄
《蚂蚁小集》·胡风·「苏州一同志」
- 1006 冯异
沧桑话旧
- 992 李离
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
- 1102 出版者的话
增补版编后记
- 1097 晓风
初版后记
- 1091 荣棣
「苏州一同志」
- 1085 朱衡
流弹
- 1075 松下子
诗人庄涌的人生之旅
- 1067 涂光群
严望——一个角色

楼适夷

(1905 - 2001)

楼适夷(1905~2001),又名楼建南。浙江余姚人。1927年开始文学活动。1928年参加太阳社,在《太阳月刊》、《拓荒者》上发表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挣扎》、《病与梦》。1929年赴日留学。1931年回国,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工作,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后参加反帝大同盟,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抗战初,在武汉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参加编辑《抗战文艺》。后又南下广州、香港,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一度代理主编。上海沦为“孤岛”后,坚持抗战文艺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后又任上海《时代日报》副刊编辑,并和靳以合编中华全国文协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又在香港与周而复共同创办《小说》月刊。建国后历任出版总署编审局二处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译文》编委等。197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出版著作有诗集《适夷诗存》、散文集《话雨录》、《鲁迅读本》等。

记胡风

1979年6月,郭老逝世周年,在他的故乡四川乐山,举行纪念学术讨论会,吴伯箫同志约我一起去参加,同行的还有郭老女公子庶英、平英姐妹,会议前后,都在成都停留了一些时候,住在四川大学,也接触了四川文学界朋友,其中还有三十年代的老战友。那时已经二十多年失了踪影的胡风,实际已在成都,住在省府招待所,并当了四川省政协委员,可没有人向我透露这个信息,直到经重庆,下三峡,返京归途,在武汉停留了几天,遇到吴奚如同志,我才知道,深悔失之交臂,未能一抒积悃。真奇怪,他冤狱已平,出了禁锢,早在省里登了衽席,好像还是个黑人,竟无人提起(或许人家还不知道)。

回到北京,我把这个好消息转告一向关心他而今天还闷在鼓里的朋友们,大家非常高兴。我还来不及照奚如告诉我的地址,写封“久违芝范、时切驰思”的问候信,他给我的信却先来了,地址当然是奚如告诉他的。这是一封约二千字的长信,依然是那密密的

蝇头小字，纤细秀丽，令人见了又愉快，又感觉得沉重。人顶多也活不上百岁，有几个二三十年呢，二三十年的一场缥缈契阔，该有多少的离情别绪，我多么想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样经历过来的，这回一定可以亲自告诉我了。

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信一开头，就是寥寥几句：“从奚如信中，知道你的情况，甚慰，谢你的关怀……”可他自己的情况呢，却一句话也没有了：“此信除聊寄怀念之意，要提提几件事。”马上进入正题，就提两件大事。一是关于雪峰的，第二，则“听说要开文代会”的事。关于雪峰，我首先挨了批评，我是常常挨老朋友批评的，像雪峰、傅雷，还有这个胡风。例如1931年刚从日本回来，左联派我去参加袁殊主办的《文艺新闻》周刊，我舞文弄墨，居然想学学日本人时髦，动手在报上写起连载小说来，以为反正每星期一千多字，可以胡编乱造，那就是《文艺新闻》发表了几期的《上海狂舞曲》，雪峰一看火了：“你在日本学了些什么啦？你写的人物与生活你一点也不熟悉，怎么能写得下去？”被他一批，果然我再也提不起笔来了，袁殊可着了急，只好替我说谎，写了个《编者启事》，说是“作者有病，连载暂停”。把连载自行腰斩了。这一暂，一直暂到八十多岁，那病还没有好。胡风的批评，记得是一次闲谈，什么文艺理论上的问题，我发表了轻率的外行话，胡风毫不客气就说我：“你这个人跑跑腿还差不多！”这话不错，我本来在上海钱庄里当过小跑街。正如荀子所说：“非我而当者，我师也！”我有时写东西，就用“鲍介”这个笔名，用以自勉。这一回，他又批了。他是读了我在《诗刊》上写的《诗人冯雪峰》，先是褒了一句，说是“空谷足音”，立刻就说，对雪峰的评价大大不足。他在信中罗列了雪峰一生战斗的业绩，一共六条，认为雪峰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关键人物，非给他应有的评价不可，否则，一定要歪曲整个的历史实际！我那篇匆匆急就的小文章，只从作为诗人的一点来写雪峰，仅仅谈诗人也谈得不足。胡风的批评我当然无可辩解。他要我“通盘考虑”，另写

一篇,先起一个底稿,再找对党的事业有责任心的人(如聂绀弩、李何林等)看看,然后送中央领导审阅,不能让人伤害死者。他认为这工作“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做了”,天啊,我怎么能担任得了呢?

第二点,他讲“听说要开文代会”,怎样做到真正的拨乱反正,主张检查历史教训,全盘考虑今后文艺运动的组织形式,要成立一个真正民主集中机构,不要急于重建那种官僚式机构,让宗派头子们当武器。这一点,他又以为我可以和雪峰问题一起,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来请求考虑。

然后他告诉我关于他在写“口号问题”的情况,已得十来万字,大概还得两万多字,不久可以完工,直接提到“中央”,并声明“我只是为党尽心而已”。

好家伙,这不依然是上书三十万言的胡风吗?二十五年的烈火焚烧,严冰冻结,好像孙行者关进老君炉一点也没有损伤了他精神上的毫毛。他一句话也不提自己,满腔满脑还是想的文艺建设的大事业。读着这样的信,我全身的细胞都感到激动,当然,我是没有来完成嘱咐的,我只附了一个短筒,把原信送交给一位中央的领导同志了。

这是胡风东山再起前我们所打的第一个交道。过了几个月,“文代会”还是举行了,可胡风并没有参加,一位同志关于胡风问题写了长篇发言稿准备作大会发言,但是被“劝退”了,没有发言。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是谈别的问题的,只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一下,没法公开,当然有许多理由,其中之一,说是“胡风问题”还在重审,不宜公开谈论,我便遵命删去,还删了别的,才在一个省的文艺刊物上与读者见面。^①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直在悬念胡风,一直到1980年3月,他被送到北京来治病,终于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他。

^① 注文太长,移至文末。

知道谷非这个名字，是1931年开始在左联工作的时候，他在日本，与左联有关系，但我不管国外联络的事，没什么交道。可能他和《文艺新闻》通过信，但现在影印的合订本上，因不署名，找不到了，只读过一本苏联通俗长篇小说的译本，题为《洋鬼》，知道是他译的，很新鲜，有兴趣。一九三二年十一、十二月吧，他回过国，是带了日共的委托，与上海地下党联络的，我是不是在上海见过，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地下党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12月派我去日本，与日共商谈1933年在远东举行泛太平洋反战大会的准备工作，告诉我到东京找张光人就找到日共。这事我在另一篇回忆文中写过。各人的回忆不一样，两个人共同经历的事，甲记了这点，忘了那点；乙却忘记这点，而记了那点，因此后来大家一兜，可不一样，胡风就记得是我们二人同行的，不过规定路中不准公开接触。我记得只我一个人独行，到了东京驿由方瀚、王达夫两人来接，然后去见了张光人。与日共负责人的接触，我记得清楚的是笹塚池田寿夫家的一次，可胡风记得的却是郊外吉祥寺井之头公园小吃店里的一次；共同一致的，则在江口涣家里与几位日本作家的会见，和为留学生间新兴文化研究会与社研东京分会互相争执的问题作调处的事，我都在另一回忆文中写过了。总之，就那一回我算正式认识了这个还没有叫“胡风”的胡风了。

我一月份回国，胡风约三月就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三个多月被驱逐出境，与聂绀弩、周颖夫妇一起到上海，是七月了。到九月我被国民党逮捕，约不到两月间，我同胡风有什么接触，也忘记了。倒是1980年他一家人定居在北京的接触中，讲起老话来了。有些进步青年自己组织起来文学小团体，主动请左翼派人去给他们指导，那事是阿英管的，他常要我去出席，一个是女青年的组织，我经常去，梅志是这组织的成员，我同她熟了。后来她已参加“左联”，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同她一起到韩起家去，胡风就住在韩起那儿，于

是梅志第一次与胡风相识了。这样一说,这对后来几十年共奋斗共患难像红宝石一样闪光的美丽而坚强的夫妇,我还是他们的“红娘”。我感到光荣,马上敲竹杠,要梅志请我吃饭,可那时胡风已经病得一天到晚坐在沙发里,像一尊石佛,我同他谈话都得请梅志夫人当翻译了。

总之,不管我的记忆如何,在他回国以后,我们的接触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不久,不仅同胡风,还有所有一切共事的朋友,都长时间长时间地隔绝了。他追随鲁迅先生在左联工作,他以一个诗人、作家和新锐文艺评论家的姿态活跃于左翼文艺界,许多事情我都是以后才了解的,甚至偶然得到几本新刊物,读到以胡风署名 的文章,我也还不能和谷非或张光人对上号。直到抗战开始,在一时成为抗战和文化中心的武汉,我到《新华日报》编副刊,这一版中有一个《文艺周刊》,报社里是请胡风编的,他每期编好了稿子亲自送来,在编辑部办公室见面,才知道:“原来胡风就是你!”这胡风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显出异常的活跃,独立主持有深远影响的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好像还兼任不少别的文化工作,住在武昌的一个有点庭园的旧式小院子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巨夫妇也住在那里。鹿地被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聘请为设计委员,在那段时期他所作反战对敌宣传的活动,几乎都由胡风给他大力帮助的。由老舍先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创办,胡风也是热情奔走的一位。由于工作和友谊的关系,那一段我们的交往还比较多,一起商量工作,讨论问题,什么都谈,有时也吵嘴。他严肃、认真、深思熟虑,热情内涵,而疾恶如仇,爱冷冷地说几句讽刺话,又是毫不留情的。正如他那魁伟的像北方佬的身体,和会说话的智慧的眼睛一样,这些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但不久,我离开已濒危急的武汉,不想随众往重庆撤退,也去不成延安,便只身像一匹孤雁似地奔向南国,与大后方文艺界的友人一直睽别到抗战胜利,我从苏北根据地重新回到上海时为止。

胡风早已从重庆转移到了上海。他的《七月》改为《希望》，还自己搞出版，总是在那里辛勤不息的默默地劳动着。我听说：在重庆时期，文艺界有过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那时两地隔绝，也看不到资料，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他，就问过也从重庆回来的雪峰，事情已经过去，雪峰好像也不大愿意谈了。他谈得很少，我只记得一句：“胡风嘛，还是懂得文艺的。”

我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他对我工作的支持。当时我在苏联办的中文报纸《时代日报》工作，担任一个叫《文化版》的副刊编辑，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文艺界的朋友是不少，但隔离了多年，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爱跑腿了，在编辑上第一个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风。报社一位青年记者老往胡风那儿跑，每次从不空手，总是带来好些文稿，供我选用，用不着为发不出稿子发愁。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学小评论，有的评论还相当尖锐。我觉得只要内容讲得有道理就采用，不管作者是谁，也没多少顾虑。这可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不作声记在心里，有一位就是打上门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发表批评他作品的文章。这质问真怪，“你写作品给人看，就不让批评吗？批评得不对你可以写反批评，一样给你登出来，要这么气势汹汹干什么？”可他还是不甘休，闹起我的火气，就把这位名作家轰走了。这段时期的工作，十年后招来了后果，让我到后面再说吧。

却说解放战争深入开展，很多朋友在上海呆不住了，在连天炮火中，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搬到解放区去，便陆陆续续转移到了香港。在香港，文艺工作一时蓬勃开展，相当热闹。后来胡风也到了香港。不知什么缘故，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又在香港重新燃起了火花，好像不见胡风发表什么新理论，论争还是重庆时代那一次继续。叫作“论争”，实际也是后来所说的“批判”。我没什么理论头脑，好些问题搞不清，对于这种事情，可以不参加就不参加了。在香港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

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你同胡风熟悉，你应该同他谈谈！”

这是一个重要使命，我当然是坚决执行，保证完成。我特地把胡风请到九龙郊外的我的寓所里，和他整整谈了半夜。“左联”后期工作中一些内部分歧，发展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以至“左联”的解散，我都不曾亲身经历，所知有限，但以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连整个抗日战争都打赢了，那些事情早已成为过去，文艺思想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大家在党的政治领导下，不会有解决不了的矛盾。这一晚的谈话，大部分是我谈得多，他说得少。我谈得很恳切，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股真诚的样子，只是微微的笑，很少答腔。看来我的话其实没有触到点子上，当然说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败了。那时大家都得写批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一个刊物老催我，问我为什么不写。我就写一篇短短的文学评论，批的是路翎的一篇什么小说，内容已经忘记，说的倒不是违心话，我就是不大喜欢那个短篇，说了自己的看法，算是完成了一件任务。

新的时间开始了，在一片欢腾的气象中，和胡风一起参加了文代会，参加了开国典礼，还作为作家去采访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盛大集会。胡风写了大气磅礴的歌唱新中国的几百行几百行的长诗，和热情洋溢的表扬英雄模范的报告特写。那时他还住在上海，但在北京相见的机会还是很多。当我参加抗美援朝，离京两年重又调回北京，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出版社的房子就在老文化部大院的旁边，我发现胡风一个人默默地住在文化部招待楼的一间屋子里，说是被召到北京专门由少数几个人结成小型座谈会同他谈文艺思想问题的。雪峰不知参加了没有，反正我和聂绀弩都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只是因为住得近，我有时跑到他的孤居的独室去看看他，见他一个人正在吃食堂里给他送来的一大碗蛋



炒饭；也有时他跑过来，那就跑到聂绀弩办公室兼卧室那间屋子，见面大家瞎聊天，从来不谈正题，也不问他们在谈些什么，并且谈得怎样了。胡风或雪峰都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

可能是一段长时期谈话的结果，胡风举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了，搞好了新居，有一天他约雪峰和我上他家吃饭，梅志同志把家安排得井井有条，饭菜做得很丰盛。我记得餐桌上没谈什么工作或文学界的事，尽随便聊聊相互的新生活。他那个小院子不错，还有庭木。讲到孩子，胡风说：“他来了，那就是爱他。”那孩子大概就指小三了。吃完了饭，我们告辞而行。胡风拿出两个包得方方正正的纸包，一包大一包小，都交给了雪峰。小的一包是钞票，是装修房子时向雪峰个人借的钱，现在归还，雪峰收下了；大的一包是稿子，一位七月诗人的诗稿，投给出版社的，雪峰当场转手交给我说：“你去处理！”说起来很抱歉，那诗稿后来被我退了。我本来不懂好诗坏诗，就是读起来读不懂，觉得别别扭扭，气味不好，就不要了。解放后胡风早已不办刊物，更不经营自己的出版事业，我这一退，稿子就冻结了。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却说到了1955年我离开工作约四五个月之久，又回到北京，才知道胡风出了大事了，就是上了那个“三十万言”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文学流派的所谓“小宗派”，一下子变成“明火执仗的反革命集团”，这还得了！当然得积极响应。《列子》中有一条寓言，某翁丢失了一把斧子，怀疑是邻人某某所偷，暗中窥察，越看越觉得这某某很像是偷斧子的人。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我就是这样，以为胡风真是偷了斧子了。应该感谢后来那场所谓“文化大革命”，使好多人懂得了一种道理，大轰大嗡，是容易把人的头脑搞昏的，不但怀疑别人，有时甚至自己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也搞不清了。于是不但被疑，还得自疑。我无意中发现在办公室抽斗里一本发信的复写留底本，不知何时到一位主持运动者的桌上去了，显然在查我是不是偷斧子的盗窃集团。